

■ 沧桑齐鲁

日军不允许教会医院给中国军人治病，教会医院就偷偷地医治。在地道专门开设了一个房间，用作实验的幌子来作掩护，救治八路军战士，甚至医生们伪装成老百姓到八路军中间救治伤员。但还是经常有日军来检查，看这里是不是有中国军人的痕迹。

南关洋楼：见证古城百年荣辱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王军 卢瑞友

明亮的月光透过法桐的枝桠洒在落满金黄树叶的地面，一只寒鸦鸣叫着飞向一座梦幻般洋楼的尖顶。在惠民县南护城河畔，矗立着六座洋楼，带有英格兰风格，曾经是英国教会医院，俗称南关洋楼。虽历经百年风雨，依然巍然伫立了一个世纪。

历经百年存遗韵

穿过惠民县南护城河一座风帆形状的石桥，右转，在几棵合抱粗的法桐、古槐掩映下，尖顶、青瓦、红窗的两幢牧师楼出现在眼前。因为无论是外形还是室内布局，都完全相同，两楼东西相距五六米，隔空相望，相得益彰。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又给它们取了个浪漫的名字——鸳鸯楼。

推门而入，红色木质地板、红色墙裙、白色墙面，交相辉映，给人一种静谧、肃穆的气氛。踏在木质地板上，发出“砰砰”的响声，工作人员介绍，因为下面是地下室，楼板是悬空的，所以会有这种响声。虽经百年，木楼板除了有几处较大的裂缝外，依然保存完整。

楼房一层，许多套间密密麻麻地排成一排，它们彼此相通，走在里面就像是闯迷宫，从这个房间进去，总能从另一个房间出来。

踏上曲折的楼梯，扶着木质的栏杆，一步步往上攀爬，阁楼的古色古香顿时扑面而来。扶梯栏杆要么雕刻有花鸟虫鱼，要么雕刻着仙鹤、梅花鹿等寓意祥瑞的动物。走到二楼前厅，门窗长而高，站在前厅往窗外张望，视野开阔，一切尽收眼底。

楼里的每一个房间都装有壁炉，一些虽用砖块堵上，用水泥抹平，但依然能看出它的痕迹。房间顶部则都有一扇方形天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利用梯子通过天窗就能爬到楼上，只是现在梯子已被人拆除，天窗也闲置下来。记者发现，楼层上下，每一个空间都被充分利用起来，甚至一些拐角处都安装上门，打开其中一扇观看，原来只能容下一人。

据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烧毁天津官北教堂，唐山和乐陵部分教堂，外国教会遭受沉重打击。第二年，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2年，英国教会华北区主教甘霖利用“赔款”，在惠民县南关吴家胡同西首西侧购置40亩空

地，后扩展成70余亩，从东北购入大批木料，开始修建楼堂。

今年85岁高龄的贾传宝老人，一直居住在洋楼附近的贾台村。他曾听家里的先辈讲，洋楼门窗的玻璃全是从西洋购置来的，运来的时候，很多人没见过玻璃啥样，就都围着看，竟有小孩把碎玻璃当成冰块往嘴里放。

1905年，首期两栋三层牧师楼建成，因造型一致，东西对称，被称作“鸳鸯楼”，1914年左右，又建成了一座三层楼房，因鸟瞰呈“山”字型，因此又被称作“山字楼”。随着教会的不断兴盛和发展，1937年，又建设了大教堂一座，之后又建起两座洋楼，另外还配有宿舍、教室、伙房、车库、发电机房等，所有建筑均为砖、木、石结构，楼房都有地下室，平房的地板也不直接与地面接触，而是下挖一部分，并设通风孔，有效地防止了潮湿。

历经32年的建设，南关洋楼建筑群形成，总建筑面积7690平方米，占地71.46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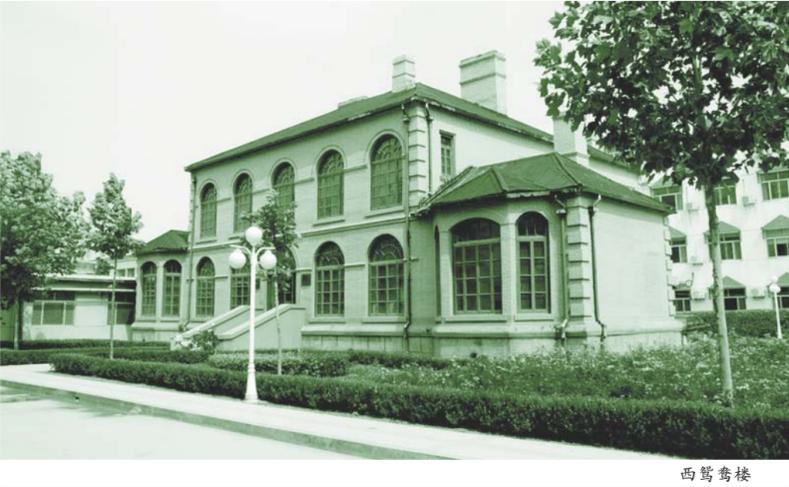
总体来看，洋楼有以下特点：一是哥特式。主要表现在房顶尖高，大量运用直线、平板，室内运用高拱卷。窗户通体高且窄，顶部为拱券型。从总平面图上看，洋楼除去那两座结构、楼层一样的牧师楼以外，其他建筑再也没有规律可循，与中国规整的建筑布局形成了鲜明对照。二是自由式。洋楼重视结构技术，装饰自由多样，每期洋楼的工期都很长，其间不断改建、加建，很难找到整体风格的统一。三是国际式。国际式建筑是建在哪里就具有哪里的本土化特征。洋楼使用的建筑材料砖石木料就地采购和烧制，楼顶设计结合了中式建筑特点，在洋楼的外围建了大量的平房，遮挡了人们的视线。增强了安全感，适合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是中西文化的融合。

西方文明进入惠民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传教士通过建教堂、兴办学校、诊所等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地域的文明进程。

1932年出生的高振华，老家是无棣县，14岁当兵。因为天生机灵，又认识一些字，被分到渤海军区后勤部医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教会医院回到人民手中，他就跟随部队驻扎在这里。此后，一直在这里工作，后来成为滨州市结防院院长。

高振华老人对英国教会医院的感受颇深，也深有研究。他介绍，中国是中医中药的发祥



西鸳鸯楼

地，医学经典是皇帝内经、神农本草等，对疑难杂症和慢性病的治疗效果明显，但对急症、外伤与感染等病情的诊疗就不尽如人意了，而西方教会医院却有明显的优势。1919年，英国教会医院正式开诊，取名“如己医院”。他们采用体温表、血压计等医疗器械和取样化验来诊断病情，当县内人们不知道听诊器为何物时，如己医院就引进了x光镜，进行人体透视，

一向被视为不治之症的，而如己医院能轻而易举地将阑尾切除，数日即愈，永不复发。再如，顽疾杨梅病，如己医院为患者注射九一四或六零六，不多时日，血相即呈阴性。至于开展外台截肢、肿瘤摘除等大型手术，在当时更为先进。医院还曾举行过医学知识展览，借以宣传教会医院和加强人们对西医技术的认识和了解。

当时院内设有病床百余张，病房多为一二十人的大病房，虽无科室之分，但有男女之别。院内还建有当时先进的生活设施，如发电照明、自来水供应等。重病患者住院每日只收包干费五角，如需手术、拍片和服用贵重药品，再另行收费；不需要住院的病人就医时，只收一角钱的挂号费；教会内的工作人员及其子女就医一律免费。当时，每日的门诊病人在50到100人左右，医院的经费由教会拨付。

由于教会医疗机构医道高明，收费低廉，群众越来越相信西医带来的好处，在惠民县享有较高声誉。正因如此，1928年，一个叫李树枫的医生瞅准了商机，在东门大街开办了一家私人西医院，名曰广德医院，口碑甚好，旋即又在大街商场增设了转售西药的鲁北大药房，西医药逐渐在全县普及开来。

另外，南关教堂在上世纪30年代就配备了汽车，惠民县最早的摩托车也是在南关教堂见到的，引领了时尚。

承载一段御寇史

几经周折，记者有幸采访到了曾经在教会医院工作过的，今年已经96岁的老人刘桂香。年近百岁的她，耳朵有些背，可身体还算硬朗，思路也挺清晰，能清楚地记得当年发生的事。

1937年11月10日夜，日军109师团所属步兵第118旅团旅团长本川省三率旅团部及119联队约4000余人入侵惠民，并制造了花家堡惨案，以割舌等残忍手段残杀群众22人，烧毁房屋数十间，花家堡不少村民家破人亡，随即惠民县也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由于日军的补给交通线遭到多次破坏，他们急需维护交通线路，进行多次报复，无辜百姓受尽折磨，村庄被烧

■ 旧闻拾遗

1923年12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葛曼生，在胶济铁路张店干段长期间突遭绑架。风波惊动京沪两地，路内路外积极斡旋。

最终一切谈妥：交钱放人。孰料，巨款交上之后，葛氏却惨遭撕票。一次没有想到的奇遇，导致全盘皆输。

胶济铁路段长被撕票案

□ 于建勇

“乒！乒！乒！”一阵急促的枪声划破夜空。一伙儿土匪和政府巡防队激烈交火。结果，巡防队落荒而逃。

地点：济南老城以东。时间：1924年1月18日。那天是农历腊月十三，还有17天就是大年，本该是一个宁静祥和的日子。

奇怪的是，第二天，这场枪战的受害者却死在老城以西，死者居然是胶济铁路高级职员葛曼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葛曼生。

葛曼生，时年34岁，字季调，浙江杭县人，1906年，由上海南洋公学（清朝末年著名实业家盛宣怀创办）附属小学升入中学。1908年赴美国留学，后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机械科。麻省理工学院被誉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

归国后，葛曼生任汉阳厂机械工程师（即现工程师），历任上海阜丰面粉厂、河南鄆城蛋厂诸工程师，奔走宣劳，声誉卓著。

胶济铁路1923年被北洋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后，为了把这条铁路搞好，政府积极网罗人才，有着海外名校背景的葛曼生，自然是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

据《青岛铁路分局志》（1899年-1900年）记载，胶济铁路“建成运营后，沿线于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修筑机车房，各配备人员100—200人不等”。民国胶济铁路管理局，“沿线青岛等机车库依次设第一至第五分段”。葛曼生就是第四分段——也就是张店分段机务段长。

葛曼生上任后，戮力经营，殚心尽力，寝无定所，食仅干粮，对工作非常投入。

让葛曼生没想到的是，危险正向他悄然袭来……

突遭绑架 惊动京沪

1923年12月3日，葛曼生在张店突遭绑架。当时山东匪患严重。据《民国匪祸录》一书记载：“1923年七八月间，山东各地有40多个县（占当时全省省份的一半），同时向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府告急，请求派兵剿匪。其中小股土匪被当地驻军、民团打退，或确系流窜而未酿成大祸的，因未加报警，尚不在内。”

打家劫舍是土匪的生存之道，因而绑票事件也就时有发生。就在葛曼生被绑架之前，这

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多次：

——二十天前，“11月13日，山东昌邑于双龙劫掠法国张家堡教堂主教罗光汉及神甫1人、中国助教5人作为人质，要求官府招安。”（《山东外事大事记（1912-1949.9）》）

——半年前，1923年5月5日，津浦线临城站附近，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第二特别快车遭土匪孙美瑶部拦截，39名外国旅客、71名中国旅客被绑架，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向北京提出最严厉的抗议。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不得与土匪谈判、妥协。此为轰动世界的“临城大劫案”。

——一年前，1922年12月1日，崂山匪首孙百万劫持了青岛总商会长会会长隋石卿和受熊炳琦之命赴青岛监管接收的专员茅少甫，以此要挟鲁案善后公署。此乃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西吉策划。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陈干前去招抚，一举成功。12月10日，孙百万率部下下山，他本人还出席了青岛接收庆典。当然，人质安然无恙。

现在，不幸又降临到葛曼生头上，他能逃出生天吗？

当然，只要有钱，一切皆有可能。果然，几天后，土匪开出了价码：赎金8万元。并附有葛曼生请求尽快筹款的信。

绑匪很清楚，段家长再有，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因此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一个“大户”——胶济铁路管理局。

葛曼生被绑架后，上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校友会屡次致电交通部和胶济铁路管理局，要求设法营救。当时交通总长依然是吴毓麟，半年前的那场“临城大劫案”，他记忆犹新，不能不高度重视。

高度重视的不仅是交通总长，还有交通部的部员。这与葛曼生的人脉有关。《民国匪祸录》中说，葛曼生“人缘好，善交际，在交通部和胶济路局朋友极多，部里的路政司司长与他更是拜把兄弟”。

胶济铁路当局自然“压力山大”，不得不向山东当局求援。毕竟，保境安民是山东当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交通部也请求山东当局协助处理。当时山东督军是郑士琦。郑士琦的上任，从一定程度说，是沾了绑匪的光。因为“临城大劫案”后，在各国公使的强大压力下，田中玉被迫于同年10月18日引咎辞职。随后，郑士琦接任，被大总统曹錕授予济威将军，加陆军上将衔。

郑士琦决定武力调停，先包围土匪，再商量赎票。这也是田中玉处理“临城大劫案”的

办法。但葛曼生家属及诸好友商议之后，担心调动军队会激怒土匪；稍有摩擦会导致撕票。因此，由葛曼生之弟葛哲生出面，向郑士琦及胶济铁路当局表示，先由家属与土匪交涉，万不得已，再请军队以武力营救。

家人有此意见，郑士琦和胶济路警务处长等人也不好勉强，表示尊重家属的愿望。

谈妥放人 未料撕票

葛哲生通过中间人与土匪说票，解释路局不同意用公款赎票，认为此例一开，以后土匪绑架铁路员工将会变本加厉。的确，要真那样的话，铁路员工岂不成了土匪流动的“提款机”。

中间人还强调说，葛曼生的家中并不宽裕，8万元实在难以筹措，请求降低一些。宽裕不宽裕不好说，8万元难筹倒是千真万确。绑匪心里自然清楚，最后，土匪同意以5万元赎票。

剩下的就是家属的事儿了。当然，郑士琦也没有袖手旁观，为配合葛家赎票，他采取敲山震虎、杀鸡吓猴的办法，在高密附近铁路沿线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剿匪。

此举果然有用。土匪急于说票成功，以便携款潜逃，竟主动将票款降为1.5万元，定于1924年1月18日交款，并随即放人。

葛氏家属向路局借了1.5万元款，查明以后逐月归还。

葛哲生遂根据中间人转达的要求，于18日夜间，独自一人携款到济南城东门外耿家林交付。

这天夜空晴朗，寒气逼人。葛哲生在一小树林里等候多时，才见树影后走出一人。那人头戴一顶罗宋帽，拉下来盖住了整个脸部，仅仅露出一双眼睛还被一副茶色眼镜遮住，面目全不可见。

“带来了吗？”匪徒因帽子捂着嘴巴，发

音不很清楚。

“全在这里了，您点点。”葛哲生把手中的包袱递过去。

那人提在手里，掂了掂，又打开看了看，重新扎好，冷冷地说：“行啦，回去等着，明天准见人。”

葛哲生不敢多问，转身匆匆返回，向焦急地等候消息的嫂子和亲友报告喜讯。

然而，第二天葛曼生并未回来，第三天也不见音信。紧接着便传来他被杀的噩耗，说尸体发现在济南西门外大槐树庄的大路旁。

葛曼生被杀后，各方震惊。最初，关于葛

曼生被撕票的原因，胶济铁路局认为是赎金未按期交给土匪，所以才导致撕票。

但葛曼生家属一再申明，已与土匪交涉清楚，并且赎金确实在18日晚上如数交给土匪。

上海南洋公学同学会公决诘问胶济铁路当局，要求北京交通部惩戒胶济铁路当局领导并剿匪恤孤，感叹“路政前途，何堪设想”。

上海麻省理工学院校友会哀悼葛曼生，召开紧急会议，致函慰问家属，并致电胶济铁路询问致死情由，质问胶济铁路局长：“既事极力营救，何故复遭惨杀？”请求迅速将营救方略及抚恤办法详细说明。

葛曼生亲属齐聚济南，要求胶济铁路当局给出说法。

胶济铁路当局赶紧派人从青岛乘火车赶往济南。经多方了解，特别是与政府方面的联系沟通，方才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绑匪遇官兵 泄愤杀人质

原来，1月18日晚，葛哲生离去后，取款土匪也急忙返回，不料刚走不远，便遇见巡逻的官军马队。

士兵见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独行，不觉起了疑心，便喝令站住，仔细盘问，又见他神色惊慌，于是下马搜查。

土匪见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独行，不觉起了疑心，便喝令站住，仔细盘问，又见他神色惊慌，于是下马搜查。

土匪见马队的几支枪都对准自己，只得垂手而立，听任检查，暗中却做好应对准备。当一名士兵从他棉袍下搜出一把盒子枪时，他乘士兵惊愕之际，一拳打翻那兵，拔腿狂奔。马队便随后追击，开枪。

令士兵没想到的是，这一开枪引起枪声一片，不过不是自己人打的，而是绑匪的同伴儿。

原来，绑匪在附近早有埋伏。毕竟治安环境不好，他们也担心取钱同伙的安全，于是在附近准备接应，没想到半路杀出程咬金：遇上丁了官兵。官兵一放枪，无异于提醒他们打开了。

士兵们一时蒙了，没想到还有埋伏，更不清楚对方有多少人，唯一能感到的就是火力很猛，情知不敌，只得掉头而逃。

在绑匪看来，家属肯定通知了政府。而且，这种先痛痛快快答应，再寻找时机消灭，是政府的一贯做法。

“临城大劫案”匪首孙美瑶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将人质释放后，他的土匪部队被改编为官军一旅，孙任旅长。半年后，兖州镇守使张培荣摆下一场“鸿门宴”，将孙美瑶诱至枣庄中

毁，逃离的村民惨遭机枪的扫射。

时年20岁的刘桂香在教会医院当护士，她介绍，日本人不允许教会医院的医生给中国人治病，要是发现，就会立刻被枪毙。194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刘桂香她们突然被喊起，说是要准备手术，病床上躺着的是一位浑身是血的人，右肩上的衣服已经破烂，伤口还在滴血，很明显受的是枪伤。可当时没有医生退宿，因为他们觉得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为了不被日军发现，他们一起把这个病人转移到牧师楼通往前平房休息室的

地道进行手术。手术很成功，这位病人在地道呆了一天，病情稳定后，被连夜接走。

后来，刘桂香听说，那天夜里，在相距15公里远的沙窝村，发生了一次和日军的战斗，八路军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成功转移。据《惠民党史》记载，该次战斗被称作沙窝突围战，八路军以几百人的力量冲破日军千余人的包围圈，创造了平原突围战的奇迹。被连夜诊治的伤员应该是八路军的一位领导，以后具体情况则不得而知了。

刘桂香说，日军不允许教会医院给中国军人治病，医院就偷偷地医治，在地道专门开设了一个房间，用作实验的幌子来作掩护，救治八路军战士，甚至医生们伪装成老百姓到八路军中间救治伤员。但还是经常有日军来检查，看这里是不是有中国军人的痕迹。

对于当年的战争场景，刘桂香印象深刻。上空敌军的飞机在盘旋咆哮，俯冲轰炸，机关枪在扫射，她们仍然在手术室工作。尽管附近的爆炸声撼动着房屋的墙壁，机关枪子弹横扫着屋顶的瓦片，她们依然站在手术工具箱旁边，传递着下一个工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侵华日军草野司令及伪武定道尹刘景尧带领日伪军强行占领了教会医院，做为司令部使用，并将外籍人员扣押后送往济南，教会医院被迫迁往他处，改名为武定道立医院。

1945年，随着惠民县城的解放，当时在医院工作的中国籍医务人员集体参加了革命，刘桂香成为新四军山东军区的一名卫生救护员。此后，她随部队转战临淄、潍坊、烟台等地。

战场上，负责侦察敌情；战场上，负责救护伤员和百姓，也埋过炸弹。

1950年，英国教会医院成为渤海军区后勤部医院，以后又依次改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第八康复医院、惠民专区第二疗养院、惠民结核病防治所、惠民地区结核病防治医院。

高振华介绍，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战争时期，甚至在抗美援朝时期，这里都曾收治了大批华东部队的慢性伤病员和朝鲜战场上转下来的志愿军受伤战士。时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肖华，曾亲自到过医院慰问医生护士，肯定了教会医院对抗日战争做出的巨大贡献。另外，教会医院还曾受到“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的亲切慰问。

如今，1902年开建的英国教会医院建筑群，是目前鲁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具有西洋风格的民国时期建筑，2013年10月被列入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时任山东督军的郑士琦

兴煤矿公司，奉郑士琦之命将其枪杀。时间就是葛曼生被绑16天后：12月19日。

崂山匪首孙百万在与政府达成协议后，部队被政府收编，很快被调往坊子。政府随后派兵围剿，孙百万被打死，这支队伍彻底消失。

前车之鉴，为时不远。绑架土匪们自然不会认为夜晚遭遇纯属巧合。他们认定，这是家属和政府联合“下套儿”，于一怒之下将葛曼生枪杀，移尸大槐树庄路边。

葛曼生为其兄之事奔波劳累、担惊受怕46天，没想到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精神大受刺激，整日如痴如呆。“葛氏兄弟一死一疯”，《民国匪祸录》如是说。

葛曼生尸体于1月25日入殓。胶济铁路局拨给治丧费1000元，将抚恤列为一等，一千多元。

鉴于葛曼生曾在南洋公学就读，南洋公学同学会胡瑞行等人特请老校长唐文治为葛曼生写了碑铭：“青州之城，张店之旁。风凄雨黯，山高水长。魂兮归来，涕泗浪浪。铭以贞之，千载毋忘。”

在此期间，绑匪依然猖狂。“1924年初，一批在济南念书的安丘籍学生，放假乘胶济路火车在黄旗堡站下车，被股匪悉数架去。”（《民国匪祸录》）

不过，让葛曼生在天之灵稍感欣慰的是，杀害他的绑匪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同年3月12日，郑瑞亭、高瑞图、高良臣三人被山东省督理署军法处枪决。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绑架有日本人的参与。据《中国二十世纪通鉴 1921-1940年》记载：“三犯曾将被架者藏于济南日本商人滨野处，勒索赎金15000元，分予滨野1500元。”